昆明学院学报　2019，41（2）：19～25，82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边疆治理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3篇文章，作者分别来自广西、贵州。郑维宽教授和林炫臻的文章选题新颖，文笔流畅，从环境史的角度对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治理困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自然环境与国家政治交互作用在文章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土司研究是近些年史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郗玉松博士的文章重点探讨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和土司遗产的价值，该研究对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具有双重意义；关于清代晚期海南海患的防御措施已有研究，但陈逸飞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从历史长时段对整个清代海南海患的防御措施进行了研究，一是延长了研究的时间跨度，二是对清代晚期海南海患的防御措施进行了一些补充。

环境史视阈下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治理困境

郑维宽，林炫臻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环境在外地人看来较为恶劣，官方文献中所谓感染“烟瘴”“岚瘴”“瘴气”，大多表现为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和感染疟疾，特别是外来的军人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劳工，染病死亡的比例甚高。烟瘴环境对外来势力的渗入无疑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因此越南统治者在对边境地区加强行政管控和军事驻防时，不得不利用土著势力，但这种方式又与加强直接管控的努力相违背，折射出边疆治理的困境。

关键词：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烟瘴环境；治理困境
中图分类号：K252；K3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9）02－0019－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9.02.004

The Governance Dilemma for the Border Areas of Northern Vietna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ZHENG Weikuan，LIN Xuanzhe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Guangxi，China　530006）

Abstract：The environment of the border areas of northern Vietnam was viewed as a rather bad one by outsiders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official documents，the so-called miasmawas in fact mostly reflected as unacclimatization and malaria infection，especially for the out-of-town soldiers and workers engaged in heavy physical labor.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who have died of malaria infection was particularly high for them. Miasma environment was undoubtedly a natural barrier for the infiltration of foreign forces. Therefore，when the Vietnamese rulers strengthened their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military garrison in the border areas，they all thought of using local indigenous forces. But this approach was also contrary to the efforts to strengthen direct management and control，which reflected the predicament of the governance.

Key words：the late Qing Dynasty；northern Vietnam；border areas；miasma environment；governance dilemma

---

收稿日期：2019－02－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0—19世纪王朝建构视野下的岭南边疆民族社会变迁研究”（13AZS017）。
作者简介：郑维宽（1971—），男，四川广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边疆史、环境史研究；林炫臻（1995—），男，广西容县人，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中越边境地区具有大致相似的环境和社会状况，两国政府对边境地区的管控都面临着环境的挑战。对于历史时期云南、广西等西南边疆的环境问题，周琼、张文、刘祥学等人做了较多研究，并且在研究思路和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较多贡献。迄今为止，与中国毗邻的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环境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立足清末中越边境地缘政治形势大变动的时代背景，探讨烟瘴环境对越南阮朝治理北部边境地区的影响，试图厘清环境、行政治理、军事管控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求教于方家。

一、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烟瘴环境

毋庸讳言，目前学术界对瘴、瘴气、瘴病、烟瘴等术语的认识还存在争议：有学者将瘴、瘴气、烟瘴视作一种自然现象，认为瘴病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疾病，是由瘴水、瘴气等引起的，并因之产生了瘴医学；[1]而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文化建构，认为其反映了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和士大夫对南部边疆地区恶劣环境的一种地域偏见；[2]有学者则认为瘴病的说法是一种主观的臆测和想象。[3]撇开上述争议，回归事实本身，不难发现，即使到了 19 世纪末期，不管是中国的游历者，还是外国亲历者，都认为越南北部边境地区仍然存在着恶劣的烟瘴环境，并影响到阮朝对边境地区的治理和开发。

（一）法国人倪思对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烟瘴环境的认识

倪思（Dr. P. Neis）是中法战争结束后法方勘界委员会的医生，他全程参与了中越边界广西段、云南段、广东段的勘界工作，并写下了《中越勘界：1885—1887》（*The Sino - Vietnamese Border Demarcation 1885 - 1887*）一书，详细记录了勘界的过程。书中记载了倪思对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瘴气产生的个人看法，以及对越南老街地区恶劣烟瘴环境的叙述。倪思认为，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稻田的抛荒是产生瘴气的重要原因，他写道："在所有布满稻田的乡村地区，如果抛荒一二年，就足以产生瘴气。即使在开发很好、人烟稠密的地区，应该说对欧洲人的身体健康和定居是无害的，但是假如这里的稻田保持休耕的状态若干年，那么这些地区将变成传染病的病灶，遭到恶性发热病的袭扰。"[4]35 可见倪思认为热带抛荒、休耕稻田中的寄生虫是"传染病的病灶"，人感染后容易患上"恶性发热病"，这里显然是指我们较为熟悉的"热瘴"（疟疾）。倪思的解释显然过于简单化，当他描述法国人在越南老街（Laokay）面临恶性疾病（即"瘴病"）的威胁时，并没有提到这些"瘴病"与当地稻田是否抛荒、休耕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老街是一个典型的山区，位于西溪与红河交汇处，沿河两岸都是连绵的群山，十分缺乏稻田，当地的土著居民主要是苗人、瑶人等，多以垦山种植旱地作物为业。很显然，法国人在老街所染恶性疾病是一种热带山地疟疾，而且染病率非常高，以致严重影响到法方的勘界工作以及法军在老街的驻防。因为疟疾的影响，法国人没有完成滇越边界的实地踏勘工作，而是通过中法双方的文本校勘，在地图上予以划定。对法国人来说，老街的环境确实恶劣，染病致死率非常高。1886 年 10 月，就有 4 个法国人在三天内死亡。在近 200 名法国外籍军团士兵中，只有 20 人是健康的。[4]137 倪思虽然是医生，但也染上疟疾，到海防休养一段时间后才得以康复。据清朝勘定滇越边界大臣周德润在奏疏中所言，可知瘴毒对法方勘界人员构成了直接伤害。光绪十二年（1886 年）七月，周德润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据狄隆（法国勘界大臣）云，现值伏暑炎天，云（南）边瘴毒最大，狄塞尔、海士皆患病。"[5]885 狄隆认为狄塞尔、海士的患病是受滇越边境的瘴气感染所致。这些疾病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史料中大量记载的"中瘴"。

不仅法国人不能适应中越边境地区的烟瘴环境，中方勘界人员也难以适应。倪思在《中越勘界：1885—1887》一书中记载了中方的一个谢姓勘界委员，谢委员出生于广州一个富有的鸦片商人家庭，通过捐钱谋得了官职，成为中方勘界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勘定滇越段边界时，谢委员感染恶性疾病，死于今河口松房（Song - Phong）。可能是受到谢委员的传染，其儿子在护送灵柩回广州的途中，也死于恶性疾病的侵袭。[4]129 - 130 这显然是一起因恶劣环境引起的悲剧事件。

（二）中国官员对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烟瘴环境的体验

早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朝官员唐景崧和张凯嵩就在日记和奏疏中记载了中越边境地区环境恶劣的情况。唐景崧于光绪十年（1884 年）奉命到越南北部了解刘永福黑旗军的驻防情况，以便谋划清军与黑旗军联合对抗法军的方略。他从广西龙州水口关进入越南境内，经过高平、太原、宣光、兴化，最后到了保胜（今越南老街）。唐景崧在《请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一路上历经的艰难险阻和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环境：光绪十年（1884 年）九月十六日，至太原送星厂（俗呼大厂），民居数间，山路极陡。从龙州水口关到送星厂，“皆深林密箐，羊肠一线，每遇丛阴，不见天日”[6]164。九月二十二日，唐景崧在给两广总督张之洞的信中写道：“牧马（即太原省城）至宣光千里，山路蚕丛，林箐蓊郁。尝行数十里，不见一人，不睹一舍。”[6]165十月一日，唐景崧在给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电文中说：“由苏街至那香，此三百里间，虽有水道，而峰截滩阻，晨舟而午陆，午陆而夕舟。陆路则岩谷一线，蕉竹弥满，藤萝纠纷，不睹天日，阴魅逼人。足涉溪泉，一二尺深浅不等。豺虎队出，夜噬人马，山蛭啮肤，野蜂成阵。”[6]168十月十八日，唐景崧记载道：“宣光水土恶毒，军中患病将四百人，又无医药，左右呻吟不绝。”[6]170

由此可见，从越南高平经太原至宣光，群山连绵，道路崎岖狭窄，到处都是深林密箐、草木蔚荟，人烟稀少，山蚂蟥等毒虫横行，虎狼出没为患，水土极为恶劣。可以说，唐景崧通过生动、详细的记录，为我们了解 19 世纪 80 年代越南北部的自然环境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请缨日记》中，唐景崧尤其提及毗邻云南的宣光省境内“水土恶毒”，导致随行清军患病者达 400 人，因为没有医药，患病者呻吟之声不绝，情景甚为凄惨。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土著居民和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似乎已经习惯了当地的环境，或者说具备了防范疾病的知识，较少提及因为水土恶毒而染病的问题。光绪九年（1883 年）二月，唐景崧记载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基本上控制了越南西北部一带，在兴化十州之地拥有很高的威望，十州土著首领都愿接受约束。[6]113-114从唐景崧的记载看，兴化所属十个羁縻州为清末来自中国两广地区的会党武装所盘踞，包括刘永福、叶成林等部。他们凭借军事上的优势，迫使十州土著首领归附，而且十州土著居民受中国人的影响，“近稍稍习汉文”。如果刘永福等部不能适应这里的环境，是很难立足的。事实上，清末广东钦廉地区和广西西南部的气候环境与越南北部相似，这才是刘永福等部能够扎根适应的根本原因。

中法战争期间，云南巡抚张凯嵩在筹拟云南边防、防备法国人入侵的奏疏中一再提及利用烟瘴环境“限隔内外”，同时招集熟悉环境、“不畏烟瘴”的开化府、临安府沿边土著居民防卡守隘，就地屯垦长驻。这是利用我方边民熟悉环境之长、制约法国人不习水土之短的典型做法。张凯嵩在《抚滇奏疏》（卷 2）之《筹维滇省大局防闲教民四条折》中说道：“臣计法人踞越，未暇窥滇，且滇越之交，冬春水涸，小轮船亦不能行。夏秋瘴疠大兴，中之辄毙，诚天之所以限中外也。”将烟瘴环境作为屏障，成为中国防范法国入侵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对内方面，张凯嵩在光绪十年（1884 年）《筹拟滇省边防折》中写道：“云南久经兵燹，土旷人稀，南路接壤越南，路径分歧，无险可扼。……拟于两郡（指开化府、临安府）各隘要招集土住贫民，拨地开垦，编查户口人丁，予以农器、籽种，令地方文员经理之。另于候补武职中遴选都守等官，分充各屯教习，编为队伍，授以技艺。土民能耐劳苦，不畏烟瘴，道路熟习，扒山踰涧，是其所长。训练成军，必能得力。”[7]在张凯嵩看来，中越边境的恶劣环境对于不适应者来说无疑是障碍，而对于熟悉者来说，则无所畏惧，正好能够加以利用。

前文论及，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烟瘴环境对于外来者来说更多是一种阻碍的因素，容易导致外来者因不适应水土和气候而染病，严重者甚至大量死亡。这里的外来者既包括来自西方的法国殖民者，也包括来自中国两广以外省份的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中国驻法参赞严璩为了了解越南境内华商的经商情形，从法国到越南各地游历考察，记

载了法国人招募福建工人到保胜修筑滇越铁路，因遭遇恶劣环境、不习水土而大量死亡的情况。据严璩《越南游历记》记载，福建工人到了保胜后，“病死者将半，所余者不及二百人”。鉴于华工病死率太高，法国筑路公司只得将幸存的福建工人遣散回籍。[8]导致福建工人在保胜大量病死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烟瘴”环境，而是长途跋涉、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工作劳累、饮食不好、缺乏医疗等多重因素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因而致病致死。若与法国人的致病因素相比，则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是共同因素。只是华工多了更多因素制约，其病死率也就更高。

民国初年，谢晓钟从上海出发，经由香港、海防、河内，然后乘坐滇越铁路火车至昆明出席活动。他在《云南游记》中记载了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因为担心沿途气候变化频繁、深山穷谷中瘴气盛行，加上饮食粗劣、不合卫生，稍不注意就容易感冒和感染风寒，因此“余于未启程前，除购罐头食品十余件，以备沿途需用外，并备仁丹、痧药、如意油、花露水、薄荷冰、阿斯庇林、西洋参诸药品，备供不时之需”[9]。随着民国时期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能够用于治疗水土不服、感冒风寒的药品已经很丰富，加上注意饮食卫生等，所谓的“瘴气”已经很难伤害外来者了。

二、清末越南对北部边境烟瘴之地行政治理的曲折过程

清末有关中国西南边疆经济开发、行政治理的研究较多，而对越南北部烟瘴之地治理的研究却甚为缺乏。在烟瘴环境对经济开发和行政治理的制约方面，中越边境地区是大致相似的。越南北部和西北部山区是土人①、苗人、瑶人等族群聚居之地，阮朝曾在北部边境地区设置了大量土府、州、县②，由土著首领进行管理。阮朝后期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管控，逐渐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并完善地方行政建置。但是北部边境地区恶劣的环境，迫使阮朝在改土归流之后仍然不得不依赖土目③等地方势力，导致实际管控较为松弛，为清末中国两广地方的会党武装和散兵游勇进入越南北部提供了机会。

相对而言，越南与两广毗邻的边境地区开发水平更高一些，与越南腹地的交往也较为密切。而毗邻云南的越南西北部边境地区则在政治上处于羁縻状态，与越南内地的联系也较为薄弱，为刘永福黑旗军、叶成林黄旗军将滇越边境地区建设为基地创造了条件。中法战争后，法方勘界大臣狄隆在发给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电报中，指出与广东、广西毗邻的广安、谅山和高平等北圻诸省，虽然土著居民占大多数，但与红河三角洲的安南人交往较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混融状态，在行政管理上也与红河三角洲地区没有大的差别。西北部的兴化、宣光等省则离河内较远，而距离老挝较近，因此在语言、文化等方面受到老挝的影响较大，与安南文化存在较大差别，在政治上也处于“自治”的状态。[5]937

越南西北部的兴化省处于越南、老挝和中国云南的交界地带，管辖嘉兴、奠边、开化、安西四府，其中嘉兴府管辖山罗州、梅山州、福州、梅州、陀北州、新州、阿农安州，奠边府管辖梅边州、遵教州、莱州、金甲州、顺州，开化府管辖水尾州、文潭州，安西府管辖昭晋州、伦州。越、老、中三国都力图在此地扩张势力及影响，导致兴化省各州县的税款有时交给越南，有时交给中国，有时交给老挝，有时则交给三方。一些毗邻中国的州县在政局混乱时宣布“独立”，或向中国表示归顺，但在名义上却未与安南断绝从属关系。上述 16 个州县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种植玉米和少量棉花、稻谷。[5]939－941阮朝后期力图加强对兴化省的控制，一方面推行改土归流，另一方面招募清人、土著居民进行开发，但这一进程遭到环境的制约和时局的影响。

（一）改土归流、增设政区与恢复土官

1840 年—1880 年的 40 年间，阮朝在西北边境的兴化省境内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并逐步完善地方

①“土人”是指当地的一种土著族群。

②“土府”“土州”“土县”，是指专门在土著族群聚居区设置的行政区划，管辖土人、苗人、瑶人等。

③土目是指土著族群的头人、首领。

基层组织。1840 年，将兴化省所辖昭晋州、沱北州、枚州的土知州改为流官，此时改流的范围尚不大。[10]卷220 1841 年，南掌国侵犯兴化省宁边州，为充实边疆，兴化护抚魏克循奏请增设府级政区，于是同年设立奠边府，管辖宁边州、莱州、遵教州，以加强对西北极边之地的管控。[11]卷8 1844 年，越南进一步在兴化、宣光二省改设流官，扩大改流的范围。[11]卷41 同时着手在边境各州之下设立“总”这一村社之上的基层组织，建构“州—总—村社”的行政体系。至于完善边境地区基层组织的原因，从兴化省臣的奏疏中可见一端：“水尾、文盘、枚州、扶安、莱州稍习汉风，请照里路远近、丁田多寡设总，置总目。”其中水尾州设 3 个总，文盘、枚州、扶安各设 2 个总，莱州设 1 个总。[11]卷41 1850 年—1856 年，进一步在兴化省上游土著居民聚居区推广“总”的设置，因为“奠边、遵教、伦州、枚州、木州、陀北、照晋等府州渐被汉风，照随里路远近、地丁相称，设总名以统属之”。其中奠边府设风清、仙峰 2 总，木州设木上、木下 2 总，照晋州设丰川、杨逵 2 总，陀北州设德关、贤良 2 总，遵教州设国安 1 总，伦州设文榜 1 总，枚州设呈吉 1 总。[12]卷5 1856 年，兴化省臣阮有和奏请增设兴化省安州、水尾州所辖“总”，其中安州设册林总，水尾州增设玉碗、乐山二总的副总，以控制通往云南境内的林间小道。[12]卷14

但是与“改土归流”、增设政区以加强管控的趋势相反，在兴化、宣光等省，经过流官驻镇 10 余年的尝试，发现环境对流官治理的制约甚大，于是一些大臣奏请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土官。1854 年，宣光按察使裴维琦奏请将宣光省属府县官改为土官，其理由有二：一是宣光省地处红河上游极边之地，阮朝初期府县官都由土官担任，运作良好；二是明命年间（1820 年—1840 年）改设流官后，因为瘴毒太盛，“府县臣才一到莅，疾病乘之，寻即向省城调养。是则有流官之名，而无流官之实，欲其渐染夏风鲜矣”，建议每县增设一个土县丞。但在朝廷征询各边省臣的意见时，大多数不同意增设土县丞，认为“自设流官来，兹每于水土稍平者，居住无何感染，而人民亦已惯习，渐染夏风”[12]卷10。但真实情况是，越南西北部边境地区的环境比北部和东北部边境地区的环境更为恶劣，当谅山、高平、广安等边省官员认为烟瘴渐消、水土稍平时，宣光、兴化等省边境地区的环境仍然较为严峻。

1869 年，鉴于越南北部边境地区匪患猖獗，为了调动土著首领的积极性，以便“以土制土”，阮朝决定恢复明命年间（1820 年—1840 年）裁撤的沿边土官。朝中大臣的意见是：“明命年间，沿边分设流官，防专袭之弊耳。然以岚瘴之地，流官既非所宜，而言语、嗜欲各不相通，非惟夷风难可一律变移，而一有不得其人，恐更导蛮侬以诈伪之习。但变法有渐，方合辰宜，应由各省详察诸土酋之后或所在豪目为蛮土所信服者，因而奏请量与职衔，俾知权自我出，方为得策。”[12]卷40 于是北部沿边地区的土官得以恢复。越南北部沿边土著居民聚居区“改土归流”10 余年的实践表明，流官治理未能根本解决加强管控、平定匪患、开发不足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因为“瘴毒太甚”，居然出现了府、县流官一到任就生病的情况，只得回到省城调理，造成政事废弛，以致朝廷官员中出现了流官非烟瘴之地所宜的说法，最后不得不“由各省详察诸土酋之后或所在豪目为蛮土所信服者，因而奏请量与职衔”。而改变北部边境地区的烟瘴环境，关键要靠人口集聚和经济开发。

（二）募民开发与时局扰攘

招募清人、土著居民进行开发，既有利于夯实阮朝统治北部边境地区的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也有利于改造该地区地广人稀、烟瘴盛行的生态环境。奠边府的开发较为典型，该府与清朝、南掌（今老挝）接壤，属于越南极边之地，人口稀少，开发较为滞后。阮朝绍治年间（1841 年—1847 年），“招募清人、土人设立铺舍，给予闲田垦辟”[11]卷44。至 1848 年，奠边府招募土著居民垦田，新设成平、敦农、颉伯、包葩、蔓凑、居来、森猛加 7 社。[12]卷2

1876 年，统督黄佐炎因为越南兴化省与中国云南开化府、临安府毗邻地区林陇多岐，地旷人稀，致使成为盗贼渊薮，请求设立“山防衙”（长官称山防使），选派官员专办屯垦事务，招募领垦者，由领垦者招徕人手垦辟荒莽之地，“仍将联络者每丁率自五十至一百名立为一里，十里或八九里

立为一乡，额籍由所在县州登著”[12]卷55。这是开发兴化沿边一带的重要行政措施。

1879 年，嗣德帝鉴于兴化、宣光、太原、高平、谅山等边省地广人稀，沦为盗贼渊薮，下令募民垦田，“以壮边疆”。要求“各省臣即察勘辖内何系原有民居及已耕征田上而逃散荒废者，紧行招抚，回复耕居。何系原未耕居荒莽田土者，渐次募垦。有欠者，官给资本，俟五年半纳半免，田土皆为私世业，十年方起科。有官吏情愿招募经理者，随多少定赏。若五年无成，各降革赔费”。对于招徕人数较多、垦荒有成效的地方，可在条件成熟时设置州县。[12]卷61

遗憾的是，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值越南北部动荡扰攘之际，先是来自中国境内的会党和游勇武装勾结地方土目，与阮朝官军对抗，后是法国入侵，导致上述措施许多都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因此，越南北部仍处于地广人稀、开发不足、环境较为恶劣的状态。

三、清末越南北部边境烟瘴环境对军事行动的消极影响

与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情况相似，由于岚瘴环境的影响，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驻防也不得不大量依赖土目和土兵①，因为越南腹地的军队很难适应越南北部山地的恶劣环境，而当地的土目、土著居民则是天然的适应者，于是招抚利用土目，招募土著居民为兵，成为越南防守北部边境地区的重要措施。

《大南实录》记载了 1844 年—1880 年间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征剿驻防受到烟瘴环境影响的情形，揭示了北部沿边地区官府统治力量薄弱、外来驻兵水土不服，只得任用乡兵、土勇的现象。1844 年 9 月，宣光布政胡祐鉴于本境与中国毗邻，地势险恶延袤、山深林密，加上烟瘴盛行，官兵难于久驻，使该地往往沦为匪盗渊薮，于是奏请利用“禾谷告熟，岚瘴稍轻”之机，带领官兵前往巡查缉匪，得到批准。[11]卷42从胡祐出兵的时间看，选择在九月岚瘴稍轻之时，可知岚瘴的气候环境对调兵征剿颇有影响。即使选择了“岚瘴稍轻”之时出兵，越南官军的战斗力仍较薄弱，因此胡祐建议发动地方土豪势力，配合官军征剿。

越南腹地军队难以适应北部边境地区烟瘴环境的问题，在随后的几十年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于是任用土目率领土兵驻守，成为阮朝治边的一个重要手段。1845 年，阮久德率兵剿捕宣光边境地区的盗匪，驻兵恩光堡，“因以暑盛瘴深，士卒多病死，遂撤兵回”[11]卷47。阮久德在从恩光堡撤兵之前，奏请在北部边境设立屯堡，选择土目率兵驻守。[11]卷48 1854 年，宣光按察使裴维琦奏称与云南开化府接壤的地区仅驻扎官兵 400 余名，实力甚为单薄，却不能从内地调兵戍守，因为该地环境恶劣，“岚瘴太深，饷馈不继，难以久居”。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招募宣光省内的苗人为兵，“拟请饬下土目、土豪、蛮长、帮长，听各募为乡兵，募得五十名者补授该队，五百者补授管奇，自相管摄。无事则耕凿相安，有事则尽数催集，计日给粮剿捕，则边境可以无事矣”[12]卷10。1858 年，阮朝将这一办法推广到兴化省奠边府，奠边府地理位置重要，但“地多岚瘴，戍兵久留不便”，于是嗣德帝采纳阮伯仪等人的建议，将驻防官兵撤回内地，而将各村居民组建奇队，由奠边府派人率领调派，防守边疆。[12]卷19经过近十年的尝试，招募土著居民组建“土勇奇”的做法不断推广。1867 年，在兴化、宣光二省所辖四个县州设立土勇奇（即由土勇组建的军事组织），其中兴化省文振县招募土勇 500 名，宣光省咸安县、枚州、霑化县招募土勇 1000 名，遴选管率，“有事征给饷免民税，无事归农，每年二月阅一次”。这是传统寓兵于农、省兵省费而且效果较好的做法。[12]卷36

在 19 世纪后期征剿越南北部来自中国的会党武装和游勇的军事行动中，往往面临着征剿效果不好的问题，而其制约因素，就是越南内地的士兵不适应越南北部的水土和气候环境，加上行军艰苦劳累、粮饷补给困难，导致染病减员严重，极大地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1865 年，北圻经略使武仲平在奏疏中谈及边境地区的外来驻兵因水土不服、染病而减员，其中调防谅山的 1700 人、高平的 500 人染病过半，加上粮饷运输困难重重，导致外来之

①“土兵”是指从当地土著居民中征召的士兵。

兵不能久驻，不如训练使用本地乡兵、土勇，既习惯水土，又能常驻防御。他说："客来之兵又不便久驻，撤去又来，派兵未能了事，不若派土著人得力而省便。"[12]卷32 1868 年，谅山省和宣光省官员段寿、阮轩等奏称沿边情势"剿抚两难"，主要困难在于"路远瘴深，征运劳费"，而招抚则往往出现叛乱反复的现象。[12]卷39 1873 年，嗣德帝向阮文祥询问北部边事为何迁延不绝，阮文祥回答说："匪徒一入上游，水毒瘴深，军行染病者多，必欲强进，不免亏损。持久未清，职此之故。"[12]卷48 可见岚瘴对于越南官军的影响很大。

综观之，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军事征剿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恶劣的烟瘴环境造成的。于是招募当地土著居民为兵，组建"土勇奇"，驻防屯堡和防守关隘，成为阮朝政府的必然选择。面临 19 世纪后期越南北部大规模的匪患，单纯利用土兵已不足以应对，于是阮朝政府不得不调集内地大军征剿，而大量的染病减员，加上粮饷补给困难，使得剿匪行动旷日持久。最后阮朝不得不向清朝求援，清朝派出的广西边防军队虽然表现比越南官军要好，但是也遇到了丛林险阻、水土恶劣的阻碍，甚至出现"疾疫弃损十常七八"的局面。

四、结语

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环境对外地人来说较为恶劣。中法战争期间，清朝官员唐景崧和张凯嵩在日记和奏疏中记载了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环境恶劣的情况。在战后的中越勘界中，不仅法方勘界委员和法军不能适应边境地区的烟瘴环境，中方勘界人员也难以适应，法方勘界委员的染病、法军的大量死亡以及中方勘界委员的染病身亡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土著居民和熟悉当地环境的外地人却有着不同的感受，对于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土著居民和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而言，似乎已经习惯了当地的环境，或者说具备了防范疾病的知识，所以较少提及因为水土恶毒而染病的问题。

对于外来者来说，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环境更多是一种阻碍的因素，容易导致外来者因不适应水土和气候环境而染病，严重者甚至大量死亡。这里的外来者既包括来自西方的法国殖民者，也包括来自中国两广以外省份的人。与法国人的致病因素相比，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是共同致病因素。从民国初年谢晓钟的记载看，随着民国时期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能够用于治疗水土不服、感冒风寒的药品已经很丰富，加上注意饮食卫生等，所谓的"瘴气"已经很难伤害外来者。因此，清末是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烟瘴环境影响外来者深入的最后一个阶段。

越南北部山区是土著族群聚居地，阮朝曾在北部边境地区设置大量土府、州、县，由土著首领进行管理。阮朝后期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管控，逐渐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并完善地方行政建置。由于北部边境地区的环境仍然十分恶劣，直接影响到阮朝政府的行政治理和军事驻防。表现在越南北部大量土府、州、县改土归流之后，仍然不得不依赖土目等地方势力，导致实际上行政管控较为松弛，甚至在兴化、宣光等省"改土归流"10 余年后，鉴于环境对流官治理的制约甚大，一些大臣奏请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土官。阮朝试图通过招募清人、土著居民对边境地区进行开发，夯实边境地区的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改善该地区地广人稀、烟瘴盛行的生态环境，但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越南北部先是遭受来自中国境内的会党和游勇武装的袭扰，后来又是法国的入侵，导致上述开发措施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越南北部仍处于地广人稀、开发不足、环境较为恶劣的状态。

与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情况相似，由于岚瘴环境的影响，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驻防不得不大量依赖土目和土兵，因为越南腹地的军队很难适应越南北部山地的恶劣环境，而当地的土目、土著居民则是天然的适应者，于是招抚利用土目，招募土著居民为兵，成为越南防守北部边境地区的重要措施。在 19 世纪后期征剿越南北部来自中国的会党武装和游勇的军事行动中，往往面临着征剿效果不好的问题，而其制约因素，就是越南内地的士兵不适应越南北部的水土和气候环境，加上行军艰苦劳累、粮饷补给困难，导致染病减员严重，极大地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不论是行政治理，还是军事驻防，清末越南北部边境地区的烟瘴环境都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这是我们分析传统社会边疆治理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下转第 82 页）

［参考文献］

［1］刘颖．版权法上技术措施的范围［J］．法学评论，2017（3）：96－106.

［2］赵加兵．论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刑法规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6（1）：98－101.

［3］王迁．论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范围［J］．法学家，2016（6）：133－145.

［4］班克庆，李晓明．版权技术措施保护模式的刑法取向［J］．广西社会科学，2011（12）：82－85.

［5］覃斌武．评美国版权法技术措施规则的司法分歧［J］．知识产权，2016（11）：98－104.

［6］孟磊，单芳．规避版权技术措施行为的刑法规制［J］．科技与出版，2016（3）：70－73.

［7］董慧娟．对技术措施直接规避行为构成独立的版权侵权的质疑［J］．知识产权，2015（5）：14－20.

［8］王迁：论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范围［J］．法学家，2016（6）：133－145.

［9］杨彩霞．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刑法规制的比较与思考［J］．政治与法律，2012（12）：52－61.

［10］杨彩霞．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合理性之质疑与反思［J］．政治与法律，2013（11）：54－64.

［11］李永升，袁汉兴．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的刑法应对［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65－71.

［12］陈忠林，陈可倩．关于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几个问题［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3）：14－18.

（上接第 25 页）

［参考文献］

［1］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J］．民族研究，2005（3）：68－77.

［3］刘祥学．当今边疆地区环境史视野下的“瘴”研究辨析［J］．江汉论坛，2013（6）：77－88.

［4］DR NEIS P.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Demarcation 1885－1887［M］．Bangkok：White Lotus Press，1998.

［5］黄铮，萧德浩．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6］佚名．中法战争资料［Z］//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7］张凯嵩．抚滇奏疏：卷1［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8］严璩．越南游历记［M］．［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05：8.

［9］谢晓钟．云南游记［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10］越南阮朝国史馆．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仁皇帝实录［M］．影印本．东京：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1973.

［11］越南阮朝国史馆．大南实录正编第三纪宪祖章皇帝实录［M］．影印本．东京：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1977.

［12］越南阮朝国史馆．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翼宗英皇帝实录［M］．影印本．东京：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1980.